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 张利杰

内容提要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拒绝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关键词 红军东征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 阎锡山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11-0130-11

DOI:10.15895/j.cnki.rwzz.2023.11.005

红军东征之役对于国共两党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性的事件。一方面,红军东征是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后发起的首次军事行动,是中共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东征之役掀起国、共、日多方势力在华北的新一轮角力,改变了国民党在晋绥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布局。目前学界关于东征的研究分属两系:一是从中共的角度阐述红军东征前后其政治军事策略制定实施的过程及意义;^①二是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切入,考察东征之役期间华北区域内的多方博弈及其内在逻辑。^②目前,有关红军东征的基本概况已被梳理清楚,遗憾的是上述两类研究分属两套叙事话语、两套分析框架,导致一些关键问题难以被融通地理解。

红军东征之役是全面抗战前夕发生在华北的一场较大规模内战,那它与当时社会上的抗日风潮有没有关系?在华北日伪势力的潜在威胁下,国共两党在战场内外对日本因素做出了怎样的因应?而这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项目“山西抗日战争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KZD002);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般项目“山西红色文旅资源开发与思政课实践教学协作路径研究”(2023JGSZ017)

① 代表性的成果有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蒋建农:《红军东征与中共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军事历史》2019年第1期;张俊峰:《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再研究——以东征往来电报信函为中心》,《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代表性的成果有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王奇生:《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博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张文俊:《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民国研究》2023年第1期。



又对战局和政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概言之,红军东征这场内战与抗战局势有着怎样的关联?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肯定东征的目的包含了抗日,但却未及论述红军如何通过政治决策与军事部署来实现该目标;民国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则将焦点放在多方势力的政治博弈上,有关抗日的议题无形中被悬置了起来。实际上,国共在东征之役中的决策和行动,无不牵涉到两党的抗日筹谋和布局,不单是中共将“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①国民党方面也把晋绥视为“中日竞争之焦点”。^②东征之役最终改变了华北军政格局,影响了两党关系的走向,它在抗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中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共双方视角,综合多方史料,力图揭示这场国共内战背后的抗日主线,以更宽阔的视野重审红军东征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进而对从国共内争到一致对外的历史转折提供一些新的理解与认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东向抗日:中共的东征决策

红军东征是一次包含着多重目的的军事行动,由于其目的复杂和多歧,过去党史研究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王东仓对此做过专门的解释,他总结出红军东征大致有三个目的:准备对日作战、巩固扩大根据地以及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④学者们普遍接受后两项说法,但对于红军东征是否有抗日目的则存在争议。有人质言:东征抗日“乃当时的政治号召,不是真正的作战目的……‘抗日’是假的”。^⑤诚然,红军主力远离抗日前线,东征中也未能与日伪势力直接交手,这样的怀疑情有可原。但通过考察中共高层东征决策的来龙去脉,会发现东征抗日不单是政治宣传上的号召,也是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步骤。

东征山西抗日的战略设想是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前后逐步成型的。1935年10月,中共陕甘晋省委就提出过“东上抗日”的远期目标。^⑥11月底,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陕北,随即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提出红军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以东、南两面为宜,并且说“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其中的利益考量,就包含了对日作战可能带来的有利影响。^⑦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决议“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东向抗日由此成为党的一项战略方针。^⑧

东征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就成为党内基本共识,不仅是因为抗日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更在于当时的局势使中共的抗日实践变为可能。自建党之初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反帝”的历史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进一步将矛头指向日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至1935年底,中共中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后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国际上,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很可能发动世界性的大战。同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5页。

② 陈诚著,何智霖等编:《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388页。

③ 金冲及、杨奎松等学者曾将红军东征嵌入到抗战视野当中,但未对东征与抗战的关联性具体展开阐述。参见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王东仓:《红军东征目的辩》,《晋阳学刊》2014年第2期。

⑤ 陈存恭:《西安事变前夕陕北红军东侵晋西之役》,(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十九)》,1997年,第376页。

⑥ 《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庆祝劳山大捷及夺取瓦窑堡空前胜利的紧急通知》(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9页。

⑦ 《毛泽东关于目前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问题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1月3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5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2页。



时,阿西尼比亚抗击意大利的民族战争以及中国高涨的反日运动,引领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这些都表明“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结合国内形势来说,日本想要“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势必引发帝国主义间——也就是英美与日本的争斗,苏联也正在准备应对日本在远东的挑战。重重外部压力之下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增多,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遇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反观中共和红军主力,在经历了长征的绝境逢生后则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①总之,在中日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共又一次面对着重大的历史机遇,政治主张乃至实际行动上的抗日准备,无疑是中共中央想要布下的战略先着。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有关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的两个决议清晰体现了中共为抗日而做的准备。政治方面,党的策略方针是发展“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过去中共的统一战线主要面向的是下层群众,现在则是要不论阶级、派别、团体来“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②这样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国内取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必须要凸显政治上的正义性。可以说,抗日既是统一战线的目的,也是统战工作赖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因此中共要更进一步地扩大统一战线,必然要在抗日上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东征抗日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共便可能在将来的政治号召和民众动员中占得先机。

军事方面,基于对敌我力量的恰当评估,中共中央确定红军(实指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方面军)1936年在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同时估计到在1936年下半年红军主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该方针可以分解为“准备力量”和“直接对日作战”前后两个目标。为了增强自身力量,红军的当下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直接对日作战”则作为下一步目标。^③红军主力东征作战的步骤便是据此设计的:第一步,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第二步,在山西击溃阎锡山主力开辟晋西根据地;第三步,由山西向绥远转进。^④如果一切顺利,红军将很可能背靠外蒙获取苏联的援助,在适宜游击作战的晋察冀交界地区与日伪军交战。因此,虽然在当时来看红军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发展自身力量,但这些都是为将来可预期到的、更具战略意义的对日作战做实质性的准备。此乃中共首次将红军主力的对日作战纳入现实层面的考量。

综上,中共中央认定东征“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这也是毛泽东在党内讨论中阐说最多的一点。^⑤“有利”所指的对象不单是巩固陕甘根据地,还在于占得抗日的战略先机。东征既是为了在当下巩固抗战力量,更是为了将来的抗日做准备。抗日也不仅是中共停留在口头上的宣传,更有了付诸行动的具体方针和步骤。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论述,参见《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9~481页;《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1~53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6页。

^③ 瓦窑堡会议前后,红军将领内部对红军主要发展方向有过分歧,本质上是对“准备力量”与“对日作战”两大任务的轻重缓急程度有不同看法。比如林彪就主张短时间内不考虑抗日,将红军主力转移至陕南打游击。最终是毛泽东出面解释,坚持将抗日作为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参见曹子洋:《东征山西还是陕南游击?——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战略决策争论》,《苏区研究》2023年第3期。

^④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26~528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7页。



最后还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抗日的敌人理应是日本帝国主义,那为何东征打的却是蒋介石和阎锡山?前文已述,打击蒋阎势力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前置步骤,而非最终目标。更何况,在中共眼中抗日与反蒋反阎并不相悖。尽管当时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但“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和“日本走狗”阎锡山起初并不在统战对象之列。中共视蒋、阎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一丘之貉,这并非是中共的宣传说辞,而是党内的基本共识。^①因此,反蒋反阎就是反卖国贼,也就是抗日。

二、两难抉择:国民党对晋绥周边局势的估计和应对

山西和绥远是红军东征的目标区域,两地虽然名义上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长期在老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治之下。阎锡山先是在中原大战中失去逐鹿中原的资本,又在“九一八事变”后持续受到日本侵华的刺激,逐渐接受了一方疆吏的角色,与南京中央蒋介石的关系趋于好转。^②1934年,蒋介石在西北之行中到访晋绥,那时他与阎锡山谈的最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③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形势就已大为不同,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将势力渗入冀察两省,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多路红军会师陕北,晋绥两省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凸显了出来。^④红军东征之役前,蒋介石和阎锡山对华北局势的估计和应对策略趋近,双方的关系也因此而更加紧密。

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演变为“安内攘外”并举。1935年,南京政府在“安内”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借着围追堵截红军长征的机会,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插入了西南和西北。但其在“攘外”方面却蒙受巨大损失,华北事变以及《何梅协定》的签订,迫使南京中央势力退出华北。是年底,蒋介石将陕甘“剿共”的重任交予张学良和东北军负责,他本人腾出更多的精力放在应付日本制造的华北危局上。蒋在日记中写道:“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奉军不力之故,决非赤匪之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是剿匪,可说已达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⑤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在其势力“西进”“北退”,战略重心由“安内”转向“攘外”的背景下,晋绥两省在抗日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国防军事的层面讲,绥远是连接中苏的重要通道,山西则是华北唯一的天然屏障。若将来中日战争爆发,晋绥无疑是国民政府获取外援、固守抵抗的战略要地。从政治格局的层面讲,日本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是通过挑拨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关系,培植亲日势力作为“地方自治”的马前卒,来达到分裂中国、侵吞华北之目的。作为反制,蒋介石必然要拉住地方实力派不至于投日,进而影响地方实力派倒向南京方面。依蒋的观察,冀察的宋哲元与日方关系暧昧,山东的韩复榘“尤为动摇”,惟有晋绥的阎锡山“深明大义”是可以拉拢的最佳人选。^⑥因此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晋绥在蒋介石的抗日筹谋中都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① 张闻天:《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1936年2月20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74~77页。

^② 参见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史林》2015年第5期。

^③ 潘晓霞:《1934年蒋介石西北之行》,《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1935年底是华北、西北地区局势较为动荡的一个时期,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在陕甘地区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张学良的统一战线活动(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或者探讨在冀察平津地区掀起巨大波澜的华北自治运动(参见贺江枫:《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贺江枫:《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何应钦北上为中心》,《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对于晋绥两省的特殊情况鲜有专门的论述。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5年“本年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5年10月“本月反省录”。



相比之下,阎锡山对周边局势变化的感知更为直接,应对也更为谨慎。为了维持其统治,他提出了“防赤睦日以自救”^①的策略。

首先是“防赤”。阎锡山自创了一套防共的理论和办法,核心要义在于教化、组织、武装民众防共,并经由经济层面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消除中共“赤化”的土壤。他自信其防共政策可以根除“赤患”,而对于出兵“剿共”持保留态度。^②直到1935年下半年,阎锡山顾虑陕北红军日益壮大,才加派四个旅的晋绥军渡河“协剿”,“能使赤匪不越黄河而东扰晋境为足”。^③总之,阎锡山认为中共的威胁在于其“赤化”能力惊人,倘使政治上的防共之法能贯彻下去,军事上只要稍加防范,就有把握将红军御于晋绥之外。

其次是“睦日”。阎锡山的“睦日”并非是要投靠日本,而是在双方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且存在一定的政治转圜空间的情况下,用暂时妥协来争取“自救”的时间。对于阎锡山来说,日本的威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日本驻华武官、特务人员,他们通常是以通信、派员的方式威逼利诱阎锡山脱离南京中央。二是日本支持的伪蒙势力,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势力秘密接受驻华日军的援助组织伪政权和军队,试图从阎锡山手中夺取绥远。对此,阎锡山判断日本不太可能直接对晋绥动武,但须防范宋哲元和韩复榘倒戈,使晋绥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因此他需要在不触怒日人的情况下,“从旁赞助”南京中央解决华北危机。^④对阎锡山来说,伪蒙势力才是他当前的心腹大患。伪蒙势力的上层人物在绥远有一定政治根基和军事武装,且与日本、伪满势力联系日益紧密,很有可能将内蒙剥离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由于绥远问题涉及民族事务和国际问题,阎锡山希望南京中央能够制定政治解决方案,并在将来日军侵绥时为其提供军事后援。^⑤由此而论,阎锡山的“睦日”“自救”策略的实现皆有赖于南京政府。

阎锡山越来越需要南京中央给予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援助。与之相对,蒋介石也需要阎锡山的支持而将晋绥打造为国民政府防日的“桥头堡”。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随着双方在对日问题上的合作共识而水涨船高。1935年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阎锡山在明知“日本必恶其亲南”^⑥的情况下仍飞赴南京出席大会,蒋介石则“决心以华北全责交阎”。^⑦12月,回到太原的阎锡山派员奔走各方,努力修复华北各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关系。次年初,“华北自治运动”尚未落下帷幕,热察地区的伪蒙军蠢蠢欲动,阎锡山派心腹徐永昌去南京“问中央要决心、要处置,事实的处置”。^⑧随后,南京中央授予阎锡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高阶职位,行政院通过了为限制伪蒙势力而制定的“分区自治办法”,并由中央财政秘密补助晋绥军每月30万的军费以及总计200万元的国防工事费用。^⑨

反观另一面,蒋介石和阎锡山在晋绥防共的问题上就少有对话。在蒋介石看来,他既然把西北“剿共”的任务交给张学良,把华北防日的任务交阎锡山,就不便再对后者“剿共”提更多的要求。阎锡山则是过于自信其政治防共之法的有效,也没有在“防共”上投入过多兵力。因此当张学良和杨虎城来找他协商应对红军“南侵东渡两企图”时,阎称“恐尚须向中央求援手也”,结果是无疾而终。^⑩总的来看,在“防共”与“抗日”的两难处境下,国民党对于晋绥的战略布置是重“抗日”而轻“防共”。孰料,1936年2

① 《阎锡山致傅作义电》(1936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06-244。

② 参见张文俊:《在畏惧与自信之间:红军东征前阎锡山对中共的防范》,《民国研究》2023年第1期。

③ 《李生达致蒋中正电》(1935年12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65-043。

④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5年10月1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17页。

⑤ 《阎锡山致徐永昌电》(1935年1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06-208。

⑥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5年10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21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5年11月24日。

⑧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1月3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63页。

⑨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2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76页。

⑩ 《阎锡山致傅作义电》(1936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03-256。



月下旬,红军已经完成了东征的准备,几乎是倾全军之力向山西发起了突袭。

三、“兄弟阋墙”:东征之役期间的国共博弈与对日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随红军主力东征山西,足见对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视和期待之高。周恩来对这场战役的结果和影响做过一个预期,大致来说最低限度是迫使晋绥军调回在陕北的晋绥军,使陕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展;较好的情况是红军在山西得以开辟一块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则是由红军东征掀起抗日热潮,推动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实现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组建。^①事实上,倘若只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向陕南开展游击战争或是向西、向北接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是更优的选择。^②正因为肩负了打开抗日局面的重大使命,中共才“要下大决心到山西”。^③

尽管国民党方面对红军东渡计划早有察觉,但没料到对方会投入如此多的兵力到山西。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河直插晋西腹地之后,阎锡山才反应过来红军“似不仅一扰乱山西企图”。^④阎锡山将半数以上的晋绥军编为四个纵队,布成“口袋阵”堵截红军。然而,灵活机动且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接连击溃晋绥军先头部队,阎锡山不得不考虑向南京中央请求援军。

国民党中央军要开入山西,日本方面是一道潜藏着的关键障碍。日本谋求华北“特殊化”,致力于肃清南京政府在华北的势力,因而忌讳中央军进入山西。晋绥当局就担心中央军的介入会刺激日本,进而给日伪军侵扰晋绥的口实。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日本若加干涉,则无异“逼晋共妥协”,“是倭之所患也,故其祸不致于激变”。^⑤不过,蒋介石也深知入晋红军如不能尽快“剿除”则难免引来日本干预,因而指示“此时宁可匪化秦中,而不可使有一匪残留于晋”。^⑥蒋介石要阎锡山“乘其范围未广、兵力未充之机一举而扑灭之”。^⑦不久,日本国内发生“二二六事件”的政变,徐永昌判断“其国内方遭巨变,当不因此早决裂也”,也建议阎锡山“为一股歼灭(红军)之计”,应尽快请中央军前来增援。^⑧1936年3月4日,阎锡山权衡战局之后,终于致电蒋介石请他调中央军入晋,对方欣然应允。

于是,国共双方的战略目标清晰了起来,国民党是要晋绥军、中央军联手迅速解决东征红军,中共则是要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从而在山西开辟根据地,一场对决在所难免。3月中旬,为了争夺晋西吕梁山脉与晋中盆地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兑九峪,红军与晋绥军主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此役过后,红军为避免陷入阵地鏖战,主动改变策略,兵分三路扩大在山西的活动范围。^⑨另一边,在国民党中央援军尚未大部投入作战之前,无力围堵红军的晋绥军只得是“寻匪主力而击之”。^⑩战局由此进

①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36年1月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② 东征前后中共中央内部对红军主攻方向的讨论,参见李爱军、王增祺:《东征前后战略方针与主攻方向的论争》,《军事史林》2020年第9期。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5页。

④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6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68-161。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2月24日。

⑥ 引文出自蒋介石给阎锡山来电的批复草稿,正式复电未见,但从阎锡山随后回电中的“秦地亦属紧要”一语可知,他收到过这封复电。参见《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6年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68-161;《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6年3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03-271。

⑦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6年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6142-00035-064。

⑧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3月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380~381页。

⑨ 具体部署是以林彪率红一军团为主力的右路军南下,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的左路军北上,总部特务团、骑兵团等少数兵力编为中路军随总指挥部继续巩固晋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1页。

⑩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6年3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69-111。



人相持阶段。

红军东征明确以抗日为目标,前已退出华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开进山西,这两件事无不刺激着日本方面。日方关注着东征战局并伺机在华北和内蒙问题上做文章。华北方面,日本陆军省起草了《关于防止山西赤化》^①的命令,要求驻华日军向冀察和晋绥两方施加影响,阻止中共和南京中央力量进入华北。驻华日军派员游说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要求与其缔结所谓的“防共协定”。同时,关东军以保侨保商的名义调动军队,华北驻屯军要求增加兵额兵员,准备在必要时侵入山西。^②内蒙方面,日方鼓动伪满、蒙势力做军事入侵晋绥的准备,并派人在绥远境内制造事端。^③日本方面一手准备武力介入,一手强化政治渗透,总之是要借机在晋绥乃至华北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攫取利益。

对于日本的意图,国民党方面心知肚明。阎锡山向南京中央反映,连日来访的日方代表“唯恐匪不窜至晋南,失去借题发挥之机会也”。^④阎提出了应对之法:“软来则不理、忍耐,硬来则与拼”。徐永昌的观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日人之胡缠,阎先生态度极是,意志亦十分坚定”。^⑤蒋介石虽然对日本方面的行动有所担忧,但他从中日国交的层面判断“倭态以内部纷乱,对我不得不渐取缓和之势”,^⑥当下似可放手用兵,惟须力求速决战事。蒋认为,此役“不仅晋省之祸福所关,实国家之存亡所系……若能集中兵力一鼓荡平,则稍缓时日尚称为有益无损”。^⑦在蒋看来,既然日方暂时不会直接介入山西战事,那么派重兵从速解决在山西的红军,不仅能够避免日方寻衅滋事,而且有机会将“剿共”毕其功于一役。于是,3月底,蒋介石派心腹陈诚入晋协助阎锡山,同时增派大批中央军前去增援,投入山西的中央军兵力达到了8个师外加3个旅。^⑧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对日策略上也有了新变化。3月下旬,随军出征的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了六次政治局会议,后被统称晋西会议。晋西会议对中共和红军的政策方针作了一些调整:政治上“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军事上确定“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这些调整旨在将抗日目标进一步明确化并提升到更为紧要的位置。^⑨张闻天强调,既然打出抗日的旗帜,那么不向东发展、不提出像“红军集中河北”这样具体的口号,“则红军不能证明为抗日先锋队”。^⑩为了使中共的抗日主张更具说服力,更应将东征的既定计划坚持贯彻下去。况且,就东征第一个月的情况来看:中共在后方已与张学良秘密达成停战协定,留守陕北的红军从地方武装手里还夺取了一些地区;红军在山西前线的发展尚属顺利,三路军在晋西南、晋西北打开了大片活动区域。因此,中共没有理由撤退,反而

① 该命令原件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1003103500、昭和11年「陸満密綴1.30~3.18」(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张群致阎锡山电》(1936年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8-0917-014。相关研究可参见王萌:《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增兵、升格及其后果》,《史林》2015年第4期;萧李居:《〈华北防共协定〉与1936年日本对华政策》,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3~655页。

③ 《傅作义致阎锡山电》(1936年3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06-337。

④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6年3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264-061。

⑤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4月6日、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02、404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3月21日,“本周反省录”。

⑦ 《蒋中正致商震转阎锡山电》(1936年3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6142-00035-089。

⑧ 包括商震第32军、汤恩伯第13军、关麟征第25师、李仙洲第21师、邹洪之第43师、孔令恂第97师、胡宗南第1师下属第1旅、黄杰第2师下属第6旅、周岳第6师下属第18旅。参见何智霖:《中央军参与山西剿共之探讨——兼论陈诚入晋指挥始末(民国25年3月至5月)》,台北:《“国史馆”学术集刊》2004年第9期,第95页。

⑨ 《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的通报》(1935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⑩ 引文为张闻天在晋西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徐占全、徐婧编:《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302~303页。



更坚定了开辟山西根据地东向抗日的决心。

4月,国民党中央军源源开到前线,战场形势逐渐发生改变,国共双方调整了各自的作战策略。中共方面,毛泽东与彭德怀下令:左路军由晋西北逐步向南移动,右路军和中路军留在晋西、晋西南,通过收缩巩固红军活动范围来确保完成“赤化”“扩红”的任务。^① 尽管形势变得不利起来,但中共仍坚持要在晋西打下一片根据地。国民党方面,阎锡山和陈诚都希望从速解决东征红军,但就采取何种作战方式的问题存在意见分歧。阎倾向以“追剿”的方法逼迫红军离晋,陈则主张取“围剿”办法在晋西消灭红军。眼看红军迟迟不退,阎锡山最终同意了陈诚的办法,下令修筑堡垒封锁线围迫红军。^② 随后的一段时间内,红军虽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赤化”“扩红”工作,但却在对手的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下失去了向东突击的时机。28日,出于保存红军实力、保卫陕甘根据地的考虑,毛泽东和彭德怀商议决定红军班师回陕。5月上旬,红军主力陆续顺利撤回陕北。

邓野对国共双方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有一个精要的总结:“关于战争的进程,彼此都缺乏足够的估计”。^③ 国民党未料到东征红军数量之多、作战能力之强,中共也未估计到中央军会迅速、大批地开入山西。言而未及的是,双方的误判在相当程度上都来自不了解对方的对日态度与谋略。中共本以为“阎可能反蒋而不抗日,来替日本清道”;^④ 国民党亦不相信中共有东向抗日的决心与行动。东征之役开始后,中共为了迅速达成抗日目的,不惜全力向东进军,并坚持要在山西开辟根据地;国民党则为避免日本方面借机干预,力图一鼓作气解决东征红军。这就是红军东征之役的吊诡之处:双方动用全力的一场内争,其开端、过程乃至结果竟深深受到了各自对日谋略的影响。

四、外御其辱:抗日视野下东征之役的历史影响

从事后看,东征之役的结果对于国共双方而言都可圈可点。红军在山西活动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兵员、物资都得到了相当的补充。^⑤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影响方面,中共以东征的实际行动“更清楚的证明了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更广泛的扩大了抗日红军的影响”。^⑥ 不仅抗日团体和左派政治家声援红军抗日,而且国民党内部亦出现了同情的声音。^⑦ 总的来看,红军东征使得陕甘根据地暂时得到巩固,抗日的影 响得以扩大,中共达成了部分预期目标任务。不过,由于巩固扩大根据地以及打通国际交通的目标没有实现,中共需要重新调整战略方向来完成东征之役的未竟使命。

在另一边,国民党虽如愿在日本未及干涉的情况下化解了红军东征,但是“剿共”与抗日的两难困境并未因此消解。起初,蒋介石打算以晋绥军30个团加上中央军15个团的兵力西渡黄河,再配合在陕甘的东北军一举根除红军。^⑧ 然而,绥远方面来自日伪的威胁始终制约着国民党的兵力调用。当晋绥当局集中力量对付东征红军之时,伪蒙势力趁机坐大。5月中旬,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察哈尔成立了伪蒙

^① 《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问题》(1936年4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08页。

^{②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4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05页。

^④ 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⑤ 《彭德怀关于以统一战线的纲领反蒋抗日巩固扩大苏区给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6年1月26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⑥ 《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5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27页。

^⑦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1936年5月3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⑧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与张国焘关系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6年5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126页。



古军政府,纠集兵力两万余人准备进占绥远和晋北。经阎锡山多次陈情,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倭寇目的以绥远为重,应急防制之”,于是“电促阎增加绥远兵力”。^①原定“追剿”红军的兵力大幅缩水,最终敲定入陕的兵力只有中央军18个团外加晋绥军8个团。^②红军虽然撤走了,但伪蒙势力却已势成,晋绥周边局势依然险峻。

对于各自未完成的任务以及想要突破的困境,国共两党制定了新的对策和方案。中共决定发动红军西征。早在毛泽东等人做出红军回师决定时,就考虑过下一步向西发展。^③红军西征既可以扩大陕甘根据地,又可以通过宁夏接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而缺点则是西征与抗日的方向相背离。如何调和抗日和求存的关系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共对内的解释是:“保卫西北,把西北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是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只有稳固自身势力才有力量对日作战。^④实际的策略则是:在军事上通过红军西征打开局面脱困求存,在政治上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来增进自身的抗日号召力。总之,红军西征是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的生存空间,为将来的抗日打下基础,并不意味放弃了向东发展的战略。^⑤

5月下旬至7月底,西征进行得比较顺利,红军向西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活动区域,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中共在西北的生存困境。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制定宁夏战役计划,试图促成红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全面会合,并与张学良、杨虎城部联合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在占领宁夏接通与苏联的国际通道后,率先与日伪势力正面交锋,掀起全国性的抗日局面。10至11月,三路红军部分会合,但宁夏战役未能按计划执行。西征战略受阻,中共再次提出红军主力东征晋绥的计划,只不过后来因为战场形势变化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二次东征未及付诸实践。^⑥总之,东征结束后中共只是出于巩固扩大根据地和打通国际交通的目的,而暂时将发展方向转向西面,不仅没有改变争取直接对日作战的方针,也从未放弃其东向抗日的战略。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和阎锡山协商后决定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出任总指挥,率两路中央军和一路晋绥军渡河进入陕北,负责陕甘“剿共”的东、北两面之责。该总指挥部名义上为“剿共”所设,实际上“于成立之始即负有抗战剿匪之双重任务”。^⑦国民党顾忌中央军留驻晋绥会刺激到日本,因而借“剿共”之名将中央军一部留置作防日之用。蒋介石对此甚为自得,认为“绥远布置与对倭策略,决定委派陈诚为西北四省总指挥之令,此着必有功效”。^⑧他还告诉阎锡山:“预料不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5月26日。

② 《林育英等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给朱德等的电报》(1936年5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③ 《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1936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3~524页。

④ 《东征的胜利和目前任务(讨论大纲)》(1936年5月16日),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

⑤ 1936年4月底,毛泽东和彭德怀给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5月底,中共中央制定的“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的任务,亦是该方针的延续。参见《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1936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4页;《毛泽东关于当前军情变化和基本任务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36年5月2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⑥ 《作战新计划》(1936年11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52~654页。另可参见段炼:《对日作战方向的初步探索——1936年红军作战新计划评析》,《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

⑦ 《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经过:第八当时之绥远及陕北》(1936年11月),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8-010702-00040-008。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5月30日。



久匪必西窜，绝不敢在陕北负隅”，尽管中央军暂时难以向绥远方面增援，但晋绥军将来大可放心将防共部队转移至防日前线。^①可见，在红军主力西去的情况下，国民党对于晋绥的布局又回到了东征之役前以防备日本为主的状态。只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和阎锡山有了更深厚的合作基础，晋绥军与中央军的联手也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6月，原定“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准备由晋入陕。军队开拔前，蒋介石就先抽走一个师南下平息“两广事变”，阎锡山也抽出大致一个师兵力留在山西修路，入陕兵力再次缩水。8月，伪蒙军王英部两千余人西侵绥东，拉开了绥远抗战的序幕。蒋介石令驻陕北的中央军第25师拨借炮兵秘密增援晋绥军。^②9月，中央军第89师参谋长吴绍周领队以“农业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晋察绥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侦察。11月，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和晋绥军第72师由陕北开回晋北，“剿共”部队在绥远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就转为抗日的后备军，对来犯的日伪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③

总而言之，红军东征之役并没有即刻扭转国共两党的战略方针，但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中共尝试通过扩大根据地、接通国际交通来打造抗日的稳固后方，国民党中央和晋绥系则进一步合作充实晋绥抗日国防，两党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抗日的方针和任务，抗日的共同意愿悄然推动着国共再度联手。

红军东征期间，中共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敌对态度开始松动，与蒋阎两方进行了试探性的接触。^④此役过后，中共发觉南京中央内部支持“联共抗日”的势力逐渐抬头，阎锡山对于“剿共”的态度有所动摇，而他们都有被争取到抗日阵线的可能。^⑤由是，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希望南京政府以“兄弟睨于墙外御其辱”的精神停战议和一致抗日，^⑥同时谋求与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各地方实力派联成统一战线。

红军东征之役还迫使国民党重新思考“剿共”抑或抗日的问题。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联共抗日，或是防共降日，东征把这问题尖锐的提了出来”。^⑦晋绥军乃至中央军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弥漫着抗日而不愿“剿共”的情绪。^⑧阻拒红军东征、西征，是国民党在“抗日”与“防共”两难抉择中将“剿共”方针贯彻到底的最后尝试。红军在东征中几乎全身而退，而在西征中又巩固了核心力量，国民党难以彻底消灭中共势力，却又不得不承受来自日伪方面与日俱增的威胁。蒋介石、阎锡山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开始寻求联共抗日的可能性。1936年下半年，南京中央与中共开始秘密谈判，阎锡山也与中共建立起了经济和情报往来。最终，以西安事变的解决为契机国共两党实现停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由此来看，在

①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6年5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20-141。

②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6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110-091。

③ 有关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相关史实，参见《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经过（二）》（1936年6月），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入藏登录号：008000000663A。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76~577页。

⑤ 有关东征期间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可参见[日]光田刚：『東征と中国共産党の「統一戦線」政策——「毛沢東年譜」所収の史料を中心として』，『立教法学』通号48，1998年。

⑥ 《毛泽东、朱德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

⑦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1936年5月3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⑧ 举例来说，东征之役结束之际晋绥军第61军军长李服膺曾表示“愿驻大同备抗日，不愿入陕剿共”，参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1936年5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23页。另外，中央军第25师参谋长詹忠言在东征之役后期曾请示“中央对职师之养成与期望素来以对国际作战为目标……现匪将就灭，去则无补于剿匪，居则有碍于抗日……拟请委座将职师调回以实国防”，参见《詹忠言致刘德芳电》（1936年4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8-0331-009。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红军东征为国共关系的破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亦可视为两党走向共同抗日的一个关键环节。

五、结论

从表面上看,红军东征山西之役既未能实现红军直接的对日作战,也没有造成华北中日两方的正面冲突,这场内战看似与抗日无关。但实际上,红军东征之役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华北地区,它深刻地受到隐含在场的日本因素影响,国共双方在东征之役前后的筹谋无不包涵着强烈的抗日意图。对中共而言,尽管东征抗日的计划事实上未能成行,但不能以此来否定中共率先抗战、领导抗战、全面抗战的意图及决心。对国民党来说,日伪势力在华北和内蒙的潜在威胁无形牵动着其应对红军东征的战略选择,使其在山西采取急进的“剿共”策略,最终改变了全面抗战前夕的华北军政格局。

1936年前后,随着日本侵华势力向华北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山西、绥远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国共两党都将晋绥视为抗击日本的重要阵地,但双方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中共是以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军事上的东征山西战略相配合,占得全国抗战的先机。国民党则是通过避免过度刺激日本来争取喘息时间,以加紧充实晋绥国防力量。以后见之明视之,不能将中共的抗日策略简单地理解为政治宣传,同样也不应将国民党对日暂时的克制忍让等视为卖国。但历史的当局者一时不了解个中内情,于是便有了颇为离奇的一幕:一面是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另一面是国民党为防止日伪势力插手而付诸全力从速消灭东征红军,双方竟在同样抗日的目标下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内争。在国民党中央军大举开入山西的情况下,红军为了保存实力退回陕北,东征之役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抗日布局随之大变,中共决定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后再谋东征抗日,国民党则是以“追剿”红军的名义在晋绥及周边地区布下了国防力量。国共在这场内战中对彼此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在全民族抗日呼声愈发高涨的背景下,双方由于共同的抗日意愿逐渐走向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重启经晋绥至冀热察的东向抗日策略,国民党则将晋绥周边国防力量投入前线战场,山西战场上迅速形成了八路军、晋绥军和中央军携手抗战的局面。^① 由是而论,东征之役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应当说,国共在抗日决心和态度上的一致性,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基础所在。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两党的抗日策略及其所依凭的力量相当迥异。国民党依凭自身在国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重视国防军事的布置,主张对日一边交涉一边抵抗;中共则是坚守独立自主性,注意抗日战略的前瞻性,且善于发挥自身在动员民众和游击作战方面的特长。国共在抗日问题上的相同与相异,预示着两党在全面抗战中将肩负起不同的责任,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① 参见张利杰:《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战略部署中的国共协调——兼论八路军的独立自主性》,《军事历史》2022年第6期。

